

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

8号 3100·028 定价 0.14 元

目 录

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劲云戈(1)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

.....北京大学 哲 军(11)

论尊儒反法.....石 仑(21)

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田 凯(38)

一百多年来反孔和尊孔的斗争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49)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唐晓文(61)

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劲 云 戈

孔子死去已经有二千四百多年了。但是，历代反动派、北洋军阀、蒋介石反动派，都捧他为“圣人”。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五四运动时期曾经批判过尊孔思想的陈独秀，当他搞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就叫嚣要“重新评定”孔子的“价值”，说什么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瞿秋白曾经搞过“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当他向蒋介石屈膝投降写《多余的话》时，就承认他自己“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有“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王明、刘少奇都是尊孔的。彭德怀也不绝口地宣扬孔子的“忠恕之道”。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在背地里装模作样地谈论“忠恕”和“仁义”，甚至在阴谋炮制反革命政变计划时也不忘写上一句“不成功便成仁”。他们是信古好古、装潢门面吗？不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他们抬出孔子的亡灵，借用孔子的名字、口号、语言和服装，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

孔子是没落的贵族奴隶主的后代，生活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末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是为了阻止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

动统治，妄图把社会拉向后退。现在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革命，竭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当代的中国社会拉向后退。因此，他们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目标就是“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已经出现以后，孔子以复辟西周贵族奴隶制度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这无疑是反动的。孔子施行“仁”的方法是“忠恕”，而“仁”的标准和限度则是“中庸”。所谓“忠恕”，孔子曾简单地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所谓“中庸”，就是不要“过”和“不及”。孔子对“仁”，还有“爱人”、“泛爱众”等欺骗性解释，来掩盖其爱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质。孔子的这些反动论调，适应了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需要，被他们吸收和发挥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们用以破

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方面，王明是突出的一个。

叛徒、卖国贼王明，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对孔子思想不进行阶级分析，反而跟在蒋介石屁股后边宣扬“孔孟之道”是什么“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他胡说孔子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种用剥削阶级的思想、传统、道德来冒充全民族的思想、传统、道德，正是孔子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的反动伎俩。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在政治上必然走上投降主义道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竭力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反对划分左、中、右，混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阶级界限，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回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去。积极推行王明路线的彭德怀，很懂得王明这一套的来路，他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却跳出来大讲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彭德怀鼓吹这一套，就是不准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不准革命人民起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明奉苏修主子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华旨意，配合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活动，又重新祭起

“尊孔”的破旗。他恶毒咒骂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的“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了他仇恨一切进步措施的反动立场。

(二)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唯心论的先验论者。孔子要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主张从“克己”做起，即要奴隶主们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多少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他又很相信“天命”，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天”赋予的。因此，孔子和他的学派特别强调“修养”和内省的工夫，即所谓“慎独”。他们要人们不去接触外界，只要关门修养就能使人从心灵深处体验出“天”所赋予的先验的知识和德性。这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一套。为了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适应地主资产阶级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叛徒刘少奇把孔子及其学派的“修养”，搬到共产党内来。

刘少奇也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早年被捕叛变，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给他的“四书”，从敌人狗洞里钻出来又重新混进党内。他早就是一个尊孔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鼓吹说：“孔子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应该充分利用它”。刘少奇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把反动说成“进步”。他所指的所谓“合理因素”和“有用”的部分，并且要加以“利用”的，就是孔子及其学派的唯心主义的“修养”。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出版的黑《修养》，就是刘少奇利

用孔子思想破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杰作”。在这本黑书里，刘少奇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大量引用孔子及其门徒关于“修养”方面的话，号召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向这些复辟奴隶制度的“圣贤”学习唯心主义的“修养”经。他要求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讲孔子的“忠恕之道”，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体贴人家，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在刘少奇看来，“逆来顺受”才算得上实行了孔子的“忠恕之道”，才算有了“修养”。在黑《修养》中，刘少奇妄图利用孔子思想，按照他自己对待敌人屈膝投降的叛徒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员。他妄想否定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深刻阐明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毛主席所培育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实行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机会主义政党，从而破坏中国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又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要把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统统交给国民党，实行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刘少奇要我们放弃武装斗争，就是妄图把我们党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只进行“议会”斗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把我们的党员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不搞革命战争、不要武装夺取政权的“议会迷”。

一九四九年，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即将在全国建立的时候，刘少奇又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一九六二年，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特别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刘少奇再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在这两个版本里，刘少奇继续发挥其尊孔思想，而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权和为将来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问题时，却连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也没有用。在引用列宁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两段语录中，刘少奇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及有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论述，都有意地删去了。对照他的另一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其反对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用心，就一目了然。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下，召开了一次疯狂吹捧孔子的黑会，竭力煽起尊孔的黑风。刘少奇在天津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说，“要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他还要革命人民“要有很大的气量去容忍一切无理的事情，不要斤斤在意气上计较”。这实质上就是不许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是什么没有“气量”啦，什么在“意气上计较”啦，就是没有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了。总之，刘少奇就是要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孔子的所谓“仁政”，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黑《修养》的要害。

孔子有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的“忠恕之道”，刘少奇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张，刘少奇就有“驯服工具论”和“群众落后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谬论，刘少奇就有“入党做官论”和“公私溶化论”。

很难怪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杰出地完成了”把孔孟思想“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任务”。刘少奇就是妄图利用孔子思想腐蚀和毒害我们的党员，使我们党员越“养”越“修”，使我们马列主义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从而使整个党和国家都改变颜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黑《修养》，批判了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沉重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罪恶企图。

（三）

孔子言必称周公、文王，说他们是天生的“圣人”，是“生而知之”的特殊天才，非常崇拜他们。至于他自己，有时虽然也说是“学而知之”者，但实际上他标榜自己也是象周公、文王那样的“天才”。他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孔子梦想把当时社会拉回到西周天子的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去，造成他所谓的“天下有道”的政治局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就是要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到承天命的奴隶主贵族的总头目手中。他又特别强调贵族奴隶主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小人”、“上知”和“下愚”的界限。为了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即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孔子大力培养和训

练了一批维护奴隶制度的人，形成一个以复辟奴隶制度为宗旨的学派或集团，并亲自率领他们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反动政治主张，寻找一个可以把它付诸实践的机会，甚至支持并准备亲自参加被他视为有利于复辟奴隶制度和打击新兴地主势力的地方叛乱。由于孔子这种对抗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行径，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只能到处碰壁。当时就有人批判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孔子的这些反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后来被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地主阶级吸收和发展为封建帝王的“天人合一”、“王权天授”的反动政治理论。

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也是尊孔派。他吹捧孔子的反动政治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疯狂地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正义措施，而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辩护。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来自孔子的“生而知之”、“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谬论。林彪混进革命队伍以后，顽固地坚持剥削阶级世界观，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林彪同刘少奇一样，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效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在背地里攻击我们对被赶下台的反动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讲“忠恕”，是“做绝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驳斥主张对敌人施“仁政”的孔孟之徒时指出：“‘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坚持了毛主席这一条原则，才保证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林彪的咒骂，只是暴露出他自己是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代理人。

林彪继承了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衣钵，大力宣扬从周朝以来的几千年的政变史，蓄谋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方法，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建立一个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林彪按照孔子唯心论的先验论，把他自己和他的儿子，打扮成什么“超天才”。他和他的死党利用各种形式“大树特树”林家父子的“绝对权威”，为建立林家父子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还网罗了一小撮反革命死党，结成一个阴谋集团，并建立武装特务组织。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林彪的指使下，这一小撮反革命死党又炮制了一个《“571工程”纪要》，精心策划了一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但是，林彪同历史上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一样，在人民群众中极其孤立，因而他们的阴谋计划必然遭到彻底失败。他们叫喊“不成功便成仁”，实际上是夜过坟场吹口哨，给自己几个死党壮胆，作垂死的挣扎罢了。林彪反党集团永远也“成”不了“仁”，请出孔子的亡灵和主义，也无法挽救他们彻底败亡的命运，就因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子的倒行逆施一样，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我们党内企图借用孔子的亡灵来达到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更加清楚地说明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们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一切

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 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

北京大学 哲 军

中庸之道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同历史上的反动剥削阶级一样，狂热地鼓吹中庸之道。他们说：中庸之道是“合理”的，是“辩证思想”，“是我民族伟大的德性之一。”他们说：孔子的中庸之道，“对于我国后来辩证哲学的发展”，“有其很大的影响”，“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如此等等。

中庸之道究竟是一种什么哲学？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它究竟为哪个阶级服务？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有必要辩论清楚。

中庸之道是孔子最先提出的。他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论语·雍也》），又说：“过”就等于“不及”（《论语·先进》），要把握住“中”（《论语·尧曰》）。后来，孔子的孙子子思和子思的学生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同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恢复“周礼”，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和偏离。这就是孔子说的最高的“德”——中庸之道的要求，实质上就是要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

从哲学上说，所谓中庸之道，就是要永远保持旧的矛盾统一体，永远保持旧质的稳定性。按照中庸之道，事情如果超过旧质的一定的限度（“过”），或者达不到一定的限度（“不及”），都应该无条件地加以反对，只有“中”是最好的，因为把握住这个“中”，就不会走向极端，旧质的稳定性就不会受到破坏了。

本来，一定的质都具有一定的界限，在这一定的界限内，一定的质就能保持它的稳定性。但是，中庸之道却把这种一定质的界限神圣化了，把旧质的稳定性绝对化了。在这里，它把旧事物说成是一种不可克服的力量，是神圣的、永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很显然，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

作为一种历史观，中庸之道就是把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加以绝对化和神圣化，否定社会的革命变革，否定社会的前进运动，主张保守，主张复旧，主张倒退。因此，中庸之道是地地道道的保守派、反动派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事物的质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事物由旧质向新质的飞跃是绝对的。事物的静止是相对的，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辩证法承认事物的质的稳定性，但是反对把这种稳定性绝对化。辩证法认为，矛盾斗争的发展，突破了一定的限度，必然要破坏旧质的稳定性，必然要引起旧统一体的破裂，引起矛盾的转化，引起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

的终结》)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的发展,总是新生事物(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不断战胜腐朽事物(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矛盾论》)

由此可见,中庸之道和革命辩证法是针锋相对的,说什么中庸之道是对立统一的思想,说什么中庸之道是辩证法,岂不是极端荒谬吗?

毛主席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矛盾论》)在中国历史上,从孔子开始,凡是反动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鼓吹中庸之道。他们鼓吹中庸之道,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维护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

孔子处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奴隶制度日益崩溃。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他提出中庸之道,就是为了维护垂死的奴隶制度,反对社会变革。孔子说:“‘中庸’真是一种最高的‘德’了。可惜实行它的人早就很少了。”子思说:“‘中庸’这种‘道’不能被人们所实行,我算是知道了”。(《中庸》)这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面对奴隶制的崩溃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悲叹。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礼坏乐崩”